

阐释变异：比较文学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路径

王 超 曹顺庆

摘要：比较文学变异学是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学科理论话语，阐释变异、流传变异和结构变异是变异学的三种主要研究路径。阐释变异是对平行研究的传承和发展。韦斯坦因等平行研究倡导者认为，中西方文明不具有类同性，因此中西文学不具有可比性。变异学理论认为差异即对话，文明互鉴、差异互补、文学互释是文学横向发展的重要规律。阐释变异侧重没有实证性影响关系的不同文明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尤其关注在差异文明语境下文学阐释的变异性、创造性和再生性，主要包含本国文学他国化和他国文学本土化两个向度。阐释变异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经验中进一步拓展，以某一种文明知识体系为主体，论述其在异域文明中的迁移、传播、接受及转化形态，为比较文学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探索了一条具体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阐释变异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比较文学 变异学

20 世纪后期以来，中国学者在传统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和建构比较文学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钱锺书、季羨林、杨周翰、乐黛云、聂珍钊、王宁等学者都提出了相关创新理论，在国际学界引起一定反响和回应。比较文学变异学就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新实践之一。李伟昉指出：“曹顺庆提出的变异学理论，以变异性为可比性基础，明确跨国、跨语际、跨文化变异和文学的他国化等文学变异学的四个层面研究。他把‘变异’提升到学科概念的高度，创立了‘变异学’这一被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所忽视的新范畴，将原来归在实证性影响研究中的‘译介学’‘形象学’划入变异学研究范畴，重新规范并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是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学科理论体系的重要突破。”^①比较文学变异学立足中华文化自信，结合中国文学实际，在影响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流传变异，在平行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阐释变异，在流传变异和阐释变异基础上进一步

〔作者简介〕王 超，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 海南海口 571158

曹顺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川成都 610064

〔收稿日期〕2024-10-31

〔基金项目〕2023 年度海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青年骨干队伍建设项目经费资助成果（王超团队）；海南省东坡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专项课题“苏东坡在 20 世纪美国的译介文献整理与阐释变异研究”（编号：HNSK〔ZDZX〕24-17）

① 李伟昉：《文化自信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创建》，《中国社会科学》2020 年第 9 期。

提出结构变异，构建了较为系统的学科理论术语范畴和话语体系。其中，阐释变异是变异学的核心思想，正如影响研究中的流传变异一样，平行研究中有各种文学变异现象。曹顺庆认为：“在没有实际影响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文学变异学研究依然是存在的。”^①然而，传统平行研究理论没有对这些变异现象进行系统分析，也没有从理论上总结出一般规律，他们侧重文学横向阐释中的类同性，淡化了变异性，因此变异学就是对平行研究的创新发展。“在比较文学上百年的实践中，变异现象其实早就存在，遗憾的是，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一直没有把它总结出来，这无疑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史的一大缺憾。变异学也并非仅仅是中国学者的独家发现，而是渊源有自的。”^②变异学的提出，正是为了弥补这个缺憾，也是为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更好地推进中西文明互鉴。具体地说，流传变异主要研究有实证影响的文学变异现象，阐释变异主要研究没有实证影响的文学变异现象。阐释变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不同文明文学他国化结构变异问题，这是建构比较文学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路径之一，也是在比较文学领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的创新策略。

一、阐释变异对平行研究的逻辑传承

平行研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那就是对于文明异质性的强制性同化和排他性拒斥，这就遮蔽了世界文明与文学的多样性、共生性。文明互鉴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方法，它实质上是一种跨文明阐释变异形态。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就是为了进一步走出单一文明的封闭圈，从多元共生、美美与共的立场出发，更加深入总结和发掘人类文明传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不是所有跨文明阐释都能实现文明互鉴和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要建构比较文学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体现“以我为主”的文化自信和基本阐释立场，否则表面上是文明互鉴，实际上可能导致一方成为另一方的亚文本或新注脚，造成强制阐释、文论“失语症”或文化病态。所以，阐释变异就是坚守中国立场，合理吸收他国话语资源，在他国文学中国化和中国文学他国化结构变异中，形成新时代比较文学发展的新路径。“在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眼光转向东方、转向中国的时候，中国学界一方面需要加强本土理论话语的建设，另一方面需要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更好地与国际学界展开对话和交流，并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引领世界学术研究的走向，为世界文学研究注入新的生命力。”^③

任何一种话语创新都有其思想渊源，尽管阐释变异是对平行研究的逻辑传承，但从更远一点看，阐释变异实际上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创新提出的一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1861年7月22日，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件中指出：“毫无疑问，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剧作家从理论上构想的那种三一律，是建立在对希腊戏剧（及其解释者亚里士多德）的曲解上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他们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因而在达西埃和其他人向他们正确解释了亚里士多德以后，他们还是长时期地坚持这种所谓的‘古典’戏剧。”^④马克思认为，法国古典主义时期推崇古希腊文学，将其视为文学艺术的典范，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也与这个观点类似。但是，古典主义“三一律”虽然从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中衍生发展而来，然而这种诗学思想已经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原初理论。“三一律”是建立在当时社会语境之下的话语创新模式，这是对古希腊戏剧理论的曲解或

① 曹顺庆：《比较文学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页。

② 曹顺庆：《比较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61—162页。

③ 苏晖：《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与中国话语建构》，《华中学术》2020年第4期。

④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8页。

不正确理解，并且这种不正确理解是故意而为之，因为它必须要遵循文学的本土化、时代化和创新发展理念。因此，以某一种文学话语为研究对象，从不同文明、时代、民族和空间语境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阐释，通过源文本与新文本的视域融合及双向对话，让源文本形成新的意义动态发展场域，这就是阐释变异的基本内涵。比较文学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阐释变异对于这种跨界文学阐释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可以让更加充分地认识到文明互鉴中的文学差异性、变异性、多元性和互补性，它在根本路径上进一步发展了平行研究，两者之间既有传承性又有创新性，既有类同性又有批判性。从学术传承性的角度来分析，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认同文本类同性特征。平行研究理论认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并不一定必须建立在事实性关联基础之上，没有实证性影响关系的文学现象也可以进行比较。比较文学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必须聚焦文学性和文本类同性，这是平行研究的一个基本观点。因此，韦勒克对影响研究进行批评，“他们把陈旧过时的方法论包袱强加于比较文学研究，并压上十九世纪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荷”^①。在他看来，比较文学的可比性不仅可以是同一文明体系之内的同源性，也可以是不同文明文学之间的类同性。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没有灿烂辉煌的历史；另一方面，影响也只是一种相对的制约，不是绝对的话语操控，“因为没有一部作品可完全归于外国的影响，或者被视为一个仅仅对外国产生影响的辐射中心”^②。比较文学变异学也没有否定这个观点，因为变异学是对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包容式创新与发展，这种包容性体现在它是“在有同源性和类同性的文学现象的基础之上，找出异质性和变异性”^③。可以看出，阐释变异不是研究随意比附中的无边界差异性，阐释也有边际约束和意义限度，不能绝对脱离类同性、文学性这类基本属性，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所以，变异学并没有否定影响研究中的同源性和平行研究中的类同性，不是绝对地“剑走偏锋”和“独辟蹊径”，而是继往开来、守正创新。

第二，认同文本跨学科特征。跨学科是比较文学的重要特征，平行研究在影响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比较文学的跨学科阐释特征，这也是其重要观点。雷迈克（又译雷马克）就指出：“比较文学研究超越一国范围的文学，并研究文学跟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诸如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其他科学、宗教等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它把一国文学同另一国或几国文学进行比较，把文学和人类所表达的其他领域相比较。”^④用一门学科的话语理论去阐释另一门学科，同样能够激发交叉学科之间的学术创造力，这也是比较文学孜孜以求的学科属性。例如，乐黛云就用自然科学中的“熵”这个范畴来阐释文学现象，尤其分析了信息熵与物理熵的区别和联系，从不同学科提供了新的阐释维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意义。比较文学变异学也同样注重跨学科比较文学之间的阐释变异问题。例如，近年来国际比较文学界最前沿的数字人文问题，就强调文学与现代数字信息技术的跨学科融合阐释及传播变异。当今比较文学界重要学者弗朗科·莫莱蒂（Franco Moretti）就创立了斯坦福文学实验室（Stanford Literary Lab），对文学进行量化研究和数据分析，让文学文本在数字技术中呈现不同的意义内涵，源文本意义在新媒体技术中发生结构性阐释变异，引领了学科发展潮流。变异学就特别注重这种交叉学科中呈现的文学话语生产和阐释变异现象。

①② 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黄源深译，载于永昌、廖鸿钧、倪蕊琴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22—123页，第123页。

③ 曹顺庆：《比较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68页。

④ 雷迈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金国嘉译，载于永昌、廖鸿钧、倪蕊琴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08页。

第三,认同文本文学性特征。如果说影响研究侧重比较文学的“比较”特征,那么平行研究就侧重比较文学的“文学”特征。平行研究不再强调各国文学之间的实证性影响关系,而是聚焦各国文学在某一个母题、概念、范畴、文类上的文本类同性,展开文学性层面的平行阐释。艾金伯勒(又译艾田蒲)认为:“比较文学史的研究与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不一样的;文学是寓于人的自然语言之中的诸形式的系统;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①然而,正因为平行研究逐步偏离了实证性阐释维度,扩大了比较文学的主观阐释元素,所以比较文学曾经在20世纪后期一度陷入文化研究的浪潮之中,丧失了文学性这个基本特征,因此也就自然而然陷入了各种危机论、死亡论的学科理论风险之中。对作品价值的深度思考就是对文学特性的审美聚焦,变异学也特别重视文本中的文学性,尤其是基于文明互鉴的文学意义阐释变异性。所以,变异学与平行研究有内在逻辑关联,这种传承关系体现在“平行研究中的变异研究,是指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在相互阐发中出现的变异状态的研究”^②。说到底,变异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还是文本的文学性特征,这就指明了阐释变异与平行研究之间的内在学理关联。

二、阐释变异对平行研究的创新发展

通过第一部分的分析,可见比较文学变异学和平行研究在类同性、跨学科、文学性等层面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变异学除了认同和传承这些基本特征之外,也同时结合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实际,创新拓展了新的研究方向,具有自己的学科理论差异属性,并提出了阐释变异的标识性概念。其核心思想在于:它将差异性和变异性作为可比性,突出强调不同文明语境中的对位、错位和移位阐释变异特征,突出强调文明互鉴和跨文明文学阐释中的多样性、差异性和移动性问题。这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同源性、类同性到多样性、变异性。应当说,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倡导者也认识到了不同文明文学的差异性、多样性、变异性等问题,只是他们还没有从根本上跨越西方文明圈的比较视域,过于强调比较文学中的同源性、类同性,对世界文学多样性研究不够。例如,歌德认为,“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或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隆或尼伯龙根就可以作为模范。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③。歌德认为,世界文学的典范还是古希腊文学,其他国家文学都应当以此为基点来进行参照比较。但是,歌德忽视了中华文明和其他非西方文明体系的原生性、多样性、差异性及其重要价值。2024年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就充分展示了东西方古典文明的交相辉映和互鉴互释。汤因比、雅斯贝尔斯等学者也充分认识到世界的“多源”文明体系特征。变异学非常重视文明互鉴和世界文学多样性问题,世界文学不应当只有某一个中心或典范,也不应当局限于西方文明,而是应当尊重不同文明文学的原生性、多样性、差异性和变异性,不能用某一种话语“强制阐释”另一种话语,也不能为了某一种“伪认同”而开展各种“求同式”比较。因此,“比较文学变异学不仅关注同源性、类同性,更关注异质性、变异性。提出异质性是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或者说比较文学可比性的基础之一是异质性,这无疑是对比较文学原有学科理论的一大挑战,同时也是一大突破和转向。”^④变异学强调从“求同性”到“异质性”的转向,从“同一性”阐释到“变异性”阐释的转向。当今世界文学史新建构主义就特别强调超越欧洲

① 艾金伯勒:《比较文学的目的,方法,规划》,戴耘译,载于永昌、廖鸿钧、倪蕊琴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99页。

② 曹顺庆:《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的变异问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③ 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13—114页。

④ 曹顺庆:《比较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67页。

中心主义的多元世界文学观，将世界文学这一单数形式变成复数形式，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所指出的，“将世界文学视为一片延伸到远方的广阔景观，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既有人称赞世界文学向全球范围的扩张提供了一种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各种地区狭隘主义的方式，以及那些批评文学全球主义者（planiterate）。”^①

第二，从求同存异到借异识同。平行研究侧重求同存异，也就是注重寻找没有实证影响关系的文学之间的相似性、类同性或通约性。美国学者韦斯坦因认为：“我不否认有些研究是可以的，例如艾金昂伯尔提倡的音韵、例像、肖像插图、文体学等方面的比较研究，但却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②韦斯坦因和歌德一样，都认为文学只能在同一个文明体系之内才有可比性，求同存异是基本研究范式。但是变异学理论则认为，不同文明文学的差异性也可以作为可比性，我们可以通过差异性来实现对话互补、多元共生、借异识同。“如果没有同，那就没有可比性。美国学者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就是这样说的。显然，西方学者大多忽略了、甚至是否定了比较中异质性与变异性的可比性问题，这是比较文学现有学科理论的一个严重不足和重大的学科理论缺憾。”^③借异识同的理念就是强调：我们要认识到差异性的重要价值，不惧怕从熟悉变得陌生，尝试从相似性的“舒适感”迂回到差异性的“不适感”中，从他者文明、他者视域、他国文学的角度来重新反思本国文学存在的问题或缺憾。叶维廉的文学“模子”理论，正是借异识同的具体实践，也是他在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外做出的第三种可能性尝试：“‘模子’的寻根探固的比较和对比，正可解决了法国派和美国派之争，因为‘模子’的讨论正好兼及了历史的衍生态和美学结构行为两个方面”^④。关于这个问题，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cois Julien，又译于连）也做出了很多尝试，他借中国文学思想差异性来分析西方文学的“思想未被思想之物”，借助差异来展开对话。例如，他分析了中国文学中的“平淡”“势”“功效”等范畴及其在西方诗学中的不可能性，对西方文学思想的反思和重构具有重要价值意义。

第三，从比较诗学到他国化结构变异。20世纪中后期，艾金伯勒提出比较诗学方法论，就是为了缓和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矛盾，从文学现象的比较深入到不同文明文学的话语理论层面的比较。他曾担心比较文学研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所以他指出，“历史的探寻和批判的或美学的沉思，这两种方法以为它们自己是势不两立的对头，而事实上，它们必须互相补充；如果能将两者结合起来，比较文学便会不可违拗地被导向比较诗学”^⑤。艾金伯勒提出的比较诗学虽然将日本、中国等东方国家诗学纳入世界诗学话语体系，但是仍然没有逃离求同存异的总体框架。近年来，王宁提出“世界诗学”这一比较文学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话语建构路径，试图从世界文学新建构主义思潮中进一步拓展延伸，从世界文学演进到世界诗学，创新发展传统比较诗学理论，建构全球化和多元文化时代的世界诗学知识谱系。比较文学变异学沿着这个思路前进，在比较诗学和世界诗学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他国化结构变异研究方法，对他国文学、文论和文化的本土化与他国化等结构变异问题进行阐释，

① David Damrosch, "World Literature as Figure and as Ground," Ursula K. Heise ed., *Futur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CLA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Repor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 134.

② 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页。

③ 曹顺庆：《比较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65页。

④ 叶维廉：《中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载温儒敏编：《中西比较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9页。

⑤ 艾金伯勒：《比较文学的目的，方法，规划》，戴耘译，载于永昌、廖鸿钧、倪蕊琴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16页。

从文学现象变异拓展到话语结构变异,从术语范畴比较拓展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例如,佛教中国化形成的禅宗,庞德将中国文学美国化阐释形成的美国现代新诗理论等,都是他国化结构变异的经典案例。变异学中的阐释变异正是对这些经典案例的理论总结。

三、阐释变异的理论特征与实践路径

平行研究和变异学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流传变异是变异学对影响研究的创新拓展,阐释变异则是变异学对平行研究的创新拓展。阐释变异是从平行研究中分离拓展出来的一种研究路径,主要研究没有实证影响关系的文学文本在跨文明阐释过程中发生的变异现象,这对于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两个结合”的一般规律来分析比较文学现象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这也是中国学者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基础上创新拓展的比较文学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话语。

(一) 阐释变异的理论内涵

什么是阐释变异?阐释变异和平行研究有何关联呢?曹顺庆指出:“平行研究中的变异研究,是指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在相互阐发中出现的变异状态的研究。”^①换言之,阐释变异是在文学文本跨文明阐发过程中发生的变异现象,尽管中国台湾学派也提出阐发研究,但是他们最大的缺憾就在于提前预设了西方诗学理论的普遍有效性,在以西释中的阐释过程中,隐形地消解了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特征。阐释变异正是要扭转这种局面,用多样性对抗同一性,用差异性置换普遍性。具体地说,“从平行研究中分离出阐释研究,从阐释研究中分离出变异研究,整合两者的学理元素,就构成阐释变异研究的理论内涵”^②。平行研究侧重阐释中的趋同性,因为同类同性才可能有对话的基础和平台,但是变异学却着力于文学阐释中的差异性和变异性。乐黛云认为:“阐释差异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它既给阐释活动带来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又为阐释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变异学着力于阐释变异研究,正向理解阐释中的差异性及其对话语生产的积极作用,并进一步提出比较文学阐释学的理论话语。相对而言,流传变异往往强调文本的实证性,实证必须要有文献媒介证据,即使没有确定的文学文本,受众也往往根据民间传闻、视频信息等资料进行主体化想象和分析阐释。阐释变异主要研究没有实证影响的文学文本在文学阐释中发生的变异,主要聚焦比较双方或多方在某一个问题上的契合点和变异点,挖掘人类文明共有或不同的思想资源。这种方式也是有效果的,正如余宝琳所说的:“一些人在不相关的作家与作品中兴奋地抓住某些在主题或实践方面明显的契合点,进行平行研究并满意地得出结论:只要其操作是‘双向阐发’(mutually illuminating),那么这种操作就是富有成效的。”^④然而,阐释变异也不是“拉郎配”式的随意比附,而是侧重某一个文本在他者语境中的创新阐释和意义变异,正如《周易》中的“易之三名”一样,变异之中也有不变的元素,不变之中也有变异的场域,形成“和而不同”的阐释形态。

(二) 阐释变异的理论特征

阐释变异是比较文学变异学的核心问题,也是重要的方法论。叶维廉认为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的主要问题在于,这部作品“是从西方批评系统演绎出来的,其含义与美感领域与中国可能具有的‘模拟论’、‘表现论’、‘实用论’及至今未能明确决定有无的‘美感客体论’,有相当历史

① 曹顺庆:《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的变异问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② 王超:《比较文学变异学中的阐释变异研究》,《当代文坛》2018年第6期。

③ 乐黛云等:《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3页。

④ 余宝琳:《间离效果:比较文学与中国传统》,载王晓路:《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第256页。

文化美学的差距”^①。也就是说，刘若愚的理论解读基本都是用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理论来强制阐释中国文论话语，看起来似乎结构完整，其实忽视了阐释变异问题。所以，比较文学变异学中的阐释变异，恰好可以弥补这个缺憾。“所谓比较文学变异学，实质上就是研究如何在不改变话语原生异质性的基础上，如何转化利用他者话语资源，从而不断发展和建构我们自身的话语体系和学术规则的学科理论。”^②阐释变异不仅是一种“比较”理念，还是一种“发展”实践，它不是一种显性的比较模式，而是一种隐性的比较意识。

从整体上说，阐释变异是对平行研究的包容性传承与发展，即使没有影响关系，也可通过双向阐释来建构意义关联域，“其创新在于：将平行研究的类同比较转向阐释比较，又将阐释比较的聚合模式转向变异模式，通过学理层面的双重分离与双重整合，继而形成阐释变异的方法论体系”^③。从实践路径来看，它分为错位、对位与移位三种形态。其中，移位阐释变异又包含现象变异与他国化结构变异两种情形：前者是局部文学话语变异；后者是通过本国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等适应性改造，滋生出理论创新活力，并且将这些新的质素转化为本国文学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整体推进话语规则层面的他国化或本土化结构变异。

阐释变异在变异学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变异学研究分支中的一类，阐释变异和其他变异学研究类型的关系体现在：“变异学分为流传变异学、阐释变异学和结构变异学三大研究体系，其主要特征分别是实证性、类同性及他国化。流传变异学又包含译介变异、传播变异和接受变异三大研究分支；阐释变异学包含错位阐释、对位阐释和移位阐释三大研究分支；结构变异学包含文学结构变异、文论结构变异和文化结构变异三大研究分支。”^④影响交流中的实证变异具有比较可靠的史料证据支撑，结构变异也可以从理论新质进行客观把握，因此相比这两种变异形态而言，“平行研究的变异问题往往容易被学者所质疑甚至忽略，因为类同关系的变异远不及建立在同源性基础上的影响研究其变异那般明显且好理解”^⑤。或者说，平行研究之可比性主要基于“文学性”而不是“实证性”，它的变异主要发生在文本“阐释”环节而不是影响“实证”环节，所以阐释变异的界定难度比较大，但是它也有相对的阐释限度和边际约束，例如不同文明的宗教信仰、价值体系、文化惯习、语言方式、思维形态等等。

阐释变异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突出从差异到间距的比较转向。什么是差异性比较？什么是间距阐释呢？如何用中西文学差异性比较开启“未思”的空间领域呢？在20世纪后期，朱利安就曾指出：“中西诗学研究的当务之急不是比较，甚至不是翻译，而是阐释，即按照中国思想本来的逻辑深入细致地剖析中国古典文论的基本范畴，理出它们特有的内涵、意义网络和运行机制，然后再将阐释的结果同西方的诗学体系相对照，作出差异性的比较。”^⑥他认为，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核心路径就是阐释，这种阐释不是用西方诗学来强制阐释中国文论，而是用中国思想本来的逻辑规则来阐释中国文论话语，即“原汤化原食”。这一段话基本描述了他的差异比较方法论，其中有三个基本规则：第一规则是按照中国思想的本然逻辑；第二规则即不要比较和翻译，而是依靠比较文学阐释，提供生成印樵结构的话语资源；第三规则就是从具体范畴上升到话语规则，将理论与实践、抽象和具体相融合。

进一步分析，为什么后来朱利安要强调从差异发展到间距呢？因为差异性是一种固定认知形态，

① 叶维廉：《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载温儒敏、李细尧编：《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叶维廉比较文学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7页。

②③④ 王超：《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452页，第362页，第452页。

⑤ 曹顺庆、曾诤：《平行研究与阐释变异》，《中国比较文学》2018年第1期。

⑥ 秦海鹰：《关于中西诗学的对话——弗朗索瓦·于连访谈录》，《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2期。

不能描述不同文明文学之间的互动性、变异性、发展性和移动性特征。从这个角度分析,阐释变异不仅仅是分析某一个范畴在他者语境中阐释的差异性,而且试图建构两个或多个支点,突出一种无关联性对视,从而形成双向的结构性反思。所以,从差异到间距的阐释变异,就引入了一种新的可比性元素。在欧洲中心主义思想下,可比性一直是一种公认度和关联性,不太强调差异元素的碰撞。朱利安采用的间距概念基于差异但是又不同于差异,也不同于列斐伏尔提出的“三元辩证空间”、哈维的“时空压缩”、索亚的“第三空间”等空间理论话语。间距不是拉开普通的空间距离,而是一种知识论和认识论层面的双向剥离。间距不是为了推进主体思维判断“如何是”,而是从外部、异域或他处反思“如何不是”。所以朱利安认为,差异标识出一种分辨,然而间距打开一种距离。阐释变异正是在间距之中嬉戏游弋、动态生成。20世纪以来西方流行所谓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文学世界共和国等,这些西方创新理论都没有真正反映中西方文明的思想距离。进一步说,差异是一种分类型的知识,有差异则有相似,它是鉴定性、知识性的话语,为了更多地掌握人类思想,就会从差异到差异,一直到终极差异,让人类更清楚地把握人类文明的知识谱系。然而,阐释变异不是突出差异或过度阐释差异中的冲突,而是突出不同文明思想的间距,回溯到思想的本源和未分化之处,形成面对面的反思和对视。

(三) 阐释变异的实践方法

如何运用阐释变异方法来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呢?根据阐释结构体系的不同,阐释变异大致可以分为错位、对位和移位三种主要实践研究类型。

1. 错位阐释变异。错位阐释变异是在理论话语与文学文本之间进行错位阐释的一种比较研究方法。对某一国文学文本,我们可以用他国文学理论体系进行错位解读,从而实现文本意义的多元化理论播散。例如,颜元叔用西方精神分析理论将李商隐诗句“蜡炬成灰泪始干”之蜡炬阐释为“男性象征”,美国学者用精神分析理论将《金瓶梅》中的“武松杀嫂”情节阐释为“武松爱嫂”等,都是错位阐释的典型案列。王国维还曾用西方悲剧诗学理论错位阐释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红楼梦》。他认为:“《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①可见,错位阐释变异的理论关键是认同差异,虽然我们不能认为某一种话语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但是我们的确可以让不同文学形态进行跨文明对话和差异性交流,在理论与文本之间错位阐释,“让老瓶装新酒”,在交叉对撞中激发话语创造力,让文学文本在新时代新理论体系中呈现新景象和新意义。

2. 对位阐释变异。对位阐释变异是指预设一种文学研究论域、类型、母题或范式,然后将不同文明文学的表现形式进行比较观照,分析其中发生的意义变异。与错位阐释不同的是,对位阐释往往是对称性比较,母题对母题、类型对类型,既研究两者之间的常量,又要分析它们之间的变量。例如,李伟昉针对中西小说题材中关于“怪”的言说论域进行跨文明对视,他认为,“满足人类在现实困境中难以如愿的情感和欲望,满足人类与生俱来的渴望探究未知领域的强烈好奇心的需要,正是英国哥特小说与六朝志怪小说的创作通则,也是其作为小说艺术殊途同归的真谛”^②。英国哥特式小说和中国六朝志怪小说是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学风格体裁,但是李伟昉并不是研究两者的类同,而是侧重分析两种不同文学传统的发展演变和传承创新。以上表明,对位阐释变异首先就要确立一个相对固定的“位”,或者说要确立比较论域是什么,然后再进行对位阐释。

3. 移位阐释变异。移位阐释变异与错位、对位阐释不同,它是将某个原生性文本本质态剥离其本身语境,置放于跨文明“新情境”中阐释时所发生的意义变异。它与错位、对位阐释变异的区别在

^①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载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2页。

^② 李伟昉:《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6—117页。

于：错位、对位是二元“并置”中的比较，而移位是一元“轮转”中的比较。移位意味着文本阐释的“先结构”或“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发生挪移，源文本进入“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之中，用赛义德的话说，即“相似的人和批评流派、观念和理论从这个人向那个人、从一情境向另一情境、从此时向彼时旅行。文化和智识生活经常从这种观念流通中得到养分，而且往往因此得以维系”^①。当然，它也不同于平行研究中的比较阐释，平行阐释是一种聚合阐释，它将两者不断靠拢、趋同，而移位阐释是一种变异阐释，它将源文本意义离散、异延、分裂。例如，朱利安从跨文明视域研究中国思想中的“中庸”“平淡”“迂回”等知识领域，得出一些与西方文明迥然相异的阐释结论，还有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中国文学思想读本》（*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中对中文论话语的阐释，都属移位阐释变异。朱利安从移位阐释变异的视角，对东西方文明异质性及其不同的审美文化形态进行迂回观照和间距化思考，通过对它们“之间”的话语形态进行阐释变异和哲学运作，促进双方的理解与话语重构。正如曹顺庆所指出的：“我认为，于连所牵涉出的问题，不仅仅是汉学的问题，更是中国的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和前沿性的问题，那就是东西方不同文明比较文学的可比性与合法性问题。”^②所以，朱利安的大部分研究实践，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上讲，正是比较文学变异学中的阐释变异研究类型。

（责任编辑：邝彩云）

① 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38页。

② 曹顺庆：《东西方不同文明文学比较的合法性与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5期。